

第二章 南越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三、南越国墓葬的形制

根据墓葬构造方式和建构材料的不同，可以将南越国墓葬划分为土坑墓、土坑竖穴木椁墓、石室墓、岩洞葬、船棺葬、瓮棺葬等六类，以土坑墓、土坑竖穴木椁墓最为常见，石室墓、岩洞葬发现很少，船棺葬、瓮棺葬仅见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本节对土坑墓、土坑竖穴木椁墓进行型式划分，并概述岩洞葬、船棺葬、瓮棺葬的情况，最后简要讨论南越国墓葬的棺椁使用问题。

(一) 墓葬形制

1. 土坑墓

土坑墓形制比较简单，规模较小，部分墓葬基底设腰坑或铺小石。墓例出自广州汉墓^[1]、平乐银山岭^[2]和乐昌对面山墓地^[3]。

A型：墓壁内收，坑口宽度大于坑底。如广州汉墓 M1002，无墓道（图 2-1:1）。

B型：墓壁平直，坑口与坑底基本同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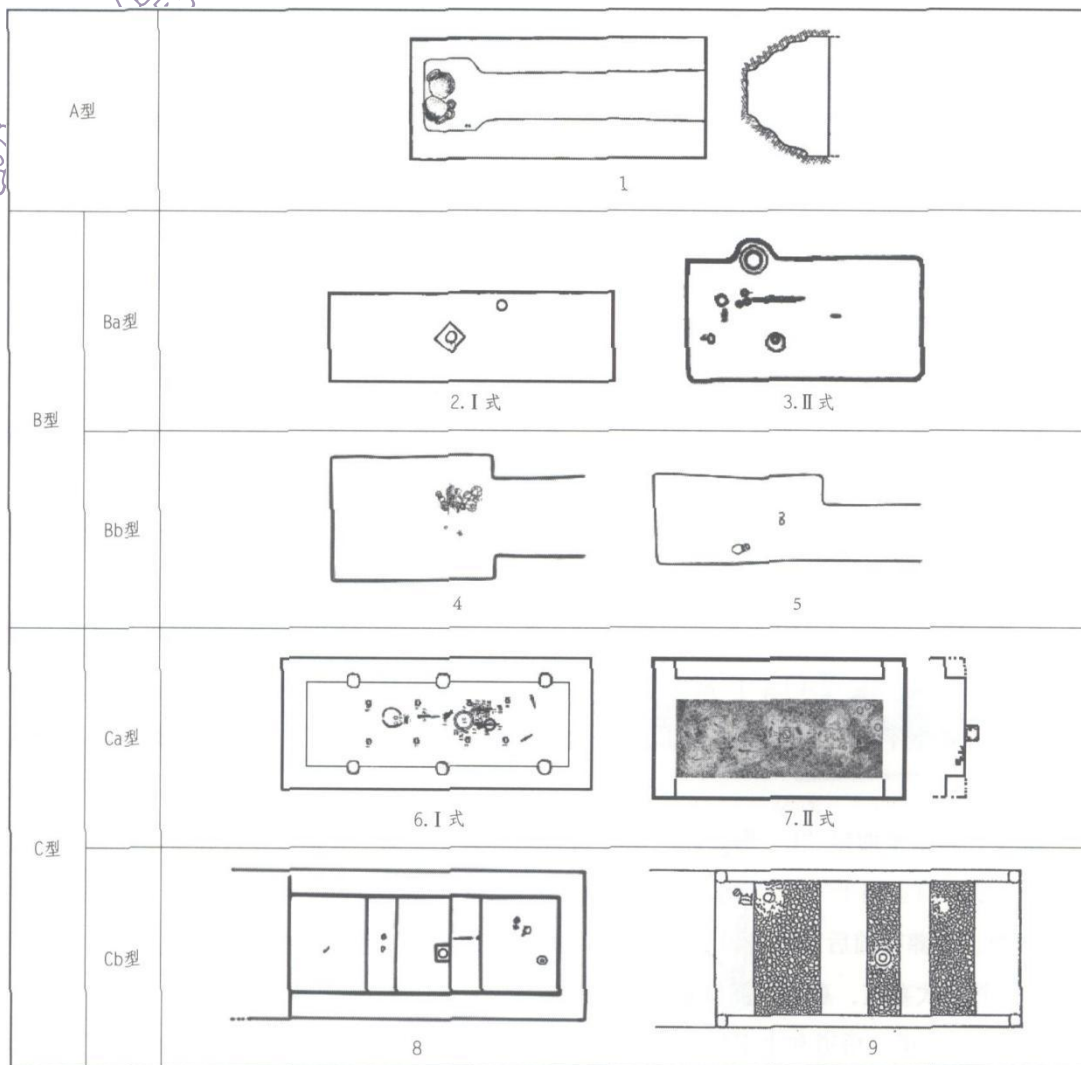
Ba型：无墓道。I式：长方形窄坑（墓坑长宽比大于 2:1）。如平乐银山岭 M107，墓坑长 1.84 米、宽 0.56 米（图 2-1:2）。II式：长方形宽坑（墓坑长宽比约等于或小于 2:1）。如乐昌对面山 M150，墓坑长 3.3 米、宽 1.7 米（图 2-1:3）。

Bb型：斜坡墓道，平面一般呈“凸”字形。如乐昌对面山 M106，墓道居中（图 2-1:4）。乐昌对面山 M61 墓道偏于一侧，呈刀把形（图 2-1:5）；平乐银山岭 M110 墓道与墓室同宽，均较罕见。

C型：设置生土或熟土二层台。

Ga型：无墓道。I式：长方形窄坑（墓坑长宽比大于 2:1）。如平乐银山岭 M55，墓口长 5.2 米、宽 2.2 米，四壁设置二层台（图 2-1:6）。II式：长方形宽坑（长宽比约等于或小于 2:1）。如平乐银山岭 M8，墓口长 3.7 米、宽约 2.0 米，两侧壁设置夯土二层台（图 2-1:7）。

Cb型：有墓道。见于平乐银山岭 M102 和 M126，墓道与墓室同宽。M102 三壁设置二层台（图 2-1:8），M126 两侧壁设置二层台（图 2-1:9）。



1.广州汉墓M1002 2.平乐银山岭M107 3.乐昌对面山M150 4.乐昌对面山M106 5.乐昌对面山M61
6.平乐银山岭M55 7.平乐银山岭M8 8.平乐银山岭M102 9.平乐银山岭M126

图 2-1 南越国土坑墓形制示意图

2. 木椁墓

土坑竖穴木椁墓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墓例出自广州汉墓、平乐银山岭、贺县河东高寨^[4]、贵县风流岭 M31^[5]、贺县金钟 M1^[6]和广州农林东路 2003GDMM68^[7]。

A 型：不设墓道。单室，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部分墓葬底设腰坑或铺小石。

Aa 型：无二层台。如广州汉墓 M1094，墓壁平齐（图 2-2:1）。

Ab 型：设置二层台。如平乐银山岭 M145，周壁有宽度不等的夯土二层台（图 2-2:2）。

B 型：设墓道。单室，墓室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墓道多为斜坡式，少量为阶梯式；墓道一般居中，少量偏于一侧。有的墓葬设置二层台，少数墓葬底铺小石。

Ba 型：斜坡式墓道。如广州汉墓 M1141，墓室平面呈梯形，墓底铺小石，墓道位置居中（图 2-2:3）。

Bb 型：阶梯式墓道。如贺县河东高寨 M5，墓底铺小石，墓道填以白膏泥（图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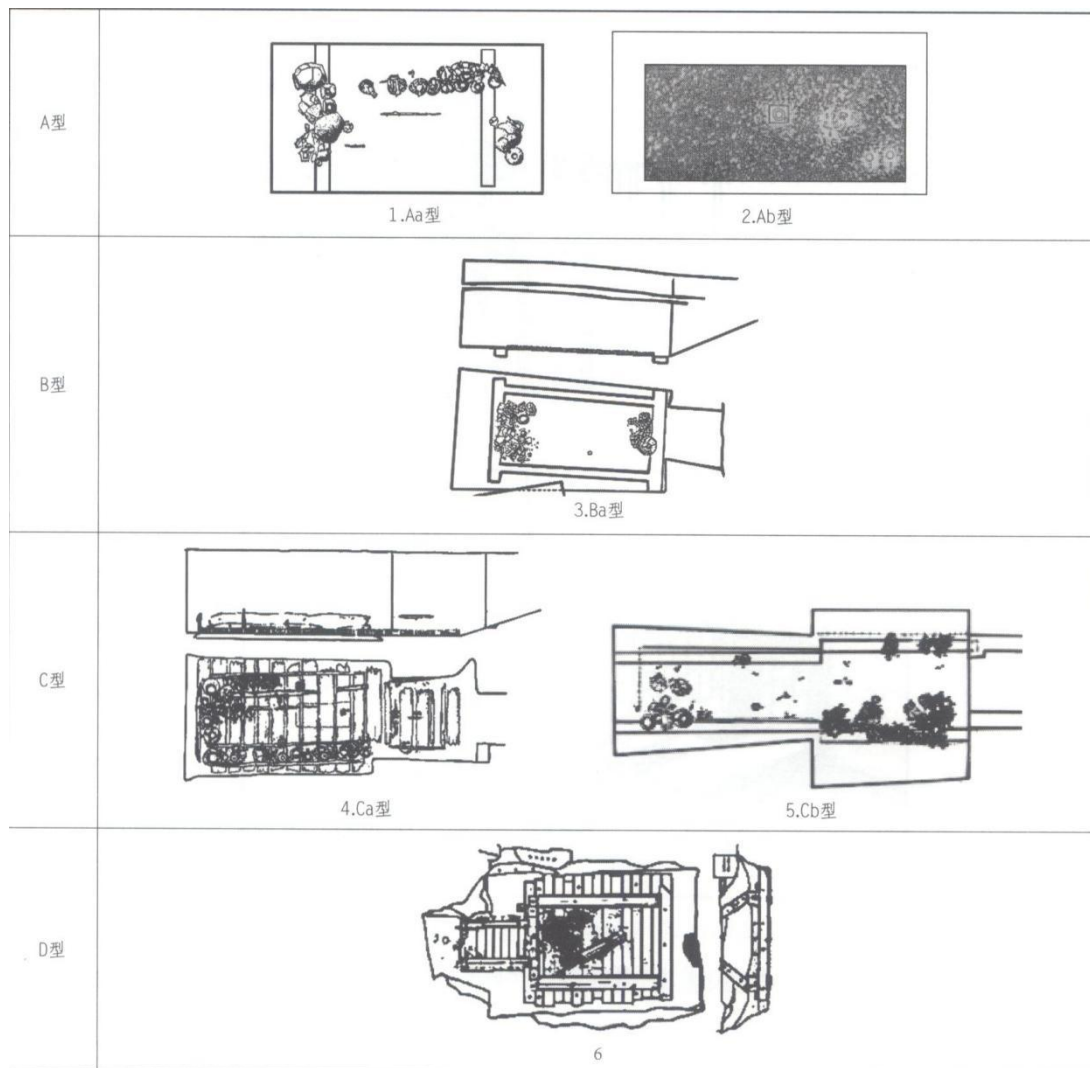
Bc 型：设置二层台。如贵县风流岭 M31，墓坑三壁有熟土夯筑的二层台，依墓道北壁设置车马坑（图 2-5:2）。

C 型：设墓道、前后双室。墓道基本为斜坡式，个别为阶梯式。有的墓葬设置二层台，个别墓葬底铺小石。

Ca 型：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如广州汉墓 M1172，前、后两室均呈近似不规整的长方形，斜坡式墓道（图 2-2:4）；广州汉墓 M1180 前、后两室平面各自呈梯形，阶梯式墓道。

Cb 型：墓室平面呈“T”形。如广州汉墓 M1174，前室略呈方形，后室呈梯形，斜坡式墓道（图 2-2:5）。

Cc 型：墓室平面呈“L”形。如广州汉墓西汉前期 III 型墓（有墓道竖穴分室木椁墓），发掘报告介绍“前室偏于一侧”^[8]。



1.广州汉墓M1094 2.平乐银山岭M145 3.广州汉墓M1141 4.广州汉墓M1172 5.广州汉墓M1174 6.广州农林东路2003GDMM68

图 2-2 南越国木椁墓形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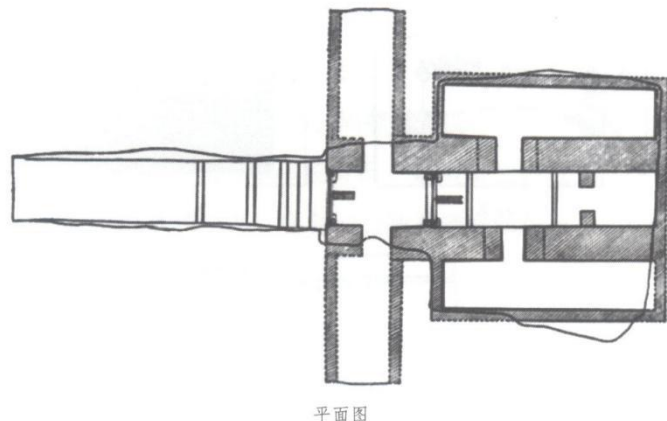
Cd型：墓葬有前后双室且设置二层台。如贺县金钟M1，平面呈“凸”字形，三壁有生土二层台，斜坡式墓道，墓坑下部填充黑膏泥（图2-5:1）。

D型：由门道、甬道和主室组成，平面呈“凸”字形，墓道情况不明，门道部分原有木构设施^[9]。如广州农林东路2003GDMM68，残长15.86米、宽8.9米（图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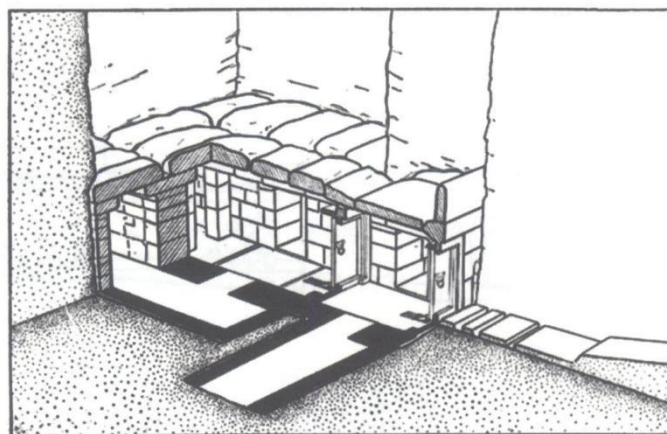
此外，贵县罗泊湾M1墓坑上部在地表夯筑，地表以下挖人生土，斜坡式墓道。地表夯筑部分的墓口平面略呈椭圆形，地表以下部分的墓口平面为依次叠增的“凸”字形^[10]，相当于前、中、后三个墓室。

3. 石室墓

仅见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1]一座。该墓模仿汉代诸侯王墓的“凿山为藏”制度，在岗顶处劈开石山凿出深达20米的“凸”字形竖穴，墓室用砂岩大石板砌筑，墓顶用24块顶盖石铺设。墓室分为前、后两部分，以两道石门闭隔，前部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为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前室、主室各有石门封闭，墓门外有外藏椁，南端接斜坡墓道（图2-3）。



平面图



透视图

图2-3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平面图、透视图

4. 岩洞葬

仅见武鸣独山岩洞葬^[12]，尸体放置在岩洞最里端一个自然形成的长方形岩穴内，掩盖一层薄土。当地发现有邕马山战国岩洞葬^[13]，独山岩洞葬继承了此种特色葬俗。

5. 船棺葬

船棺葬见于东山文化的红河类型，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平原低地，现已发现船棺葬墓地 38 处，初步统计有 160 余座^[14]。东山文化船棺葬绝大多数是在土坑内掩埋船棺，有些使用木桩、竹竿支撑加固。船棺的制作方式是将原木剖为两半，分别剜凿成凹槽状的棺盖和棺室，形似船舱；棺盖、棺室有些是将原木中心挖空成独木舟状，有些是整条挖通，两端各自插立半圆形挡板。

东山文化和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分期编年尚有争议，就现有认识，东山文化船棺葬暂可以划分为 3 期，早期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相当于战国时期；中期为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相当于瓯骆国和西汉交趾郡时期；晚期为公元 1 至 2 世纪，相当于东汉交趾郡时期（参见附录《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年代学研究评述》）。若认可赵佗击败安阳王在越南北部设置郡县的记载^[15]，那么越南红河平原相当于西汉前期的东山文化船棺葬中有些遗存可能属于南越国时期，如著名的越南海防市越溪 M2 船棺大墓^[16]。

6. 瓮棺葬

瓮棺葬见于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多由陶釜、陶罐、陶锅等相互扣合而成。越南学者一般认为瓮棺葬出现在东山文化的典型期阶段（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其后沿袭使用^[17]。同船棺葬一样，不排除在越南北部的相当于西汉前期的东山文化瓮棺葬中有些可能属于南越国时期。

（二）棺槨制度

南越国墓葬大多采用木质葬具，个别有直接掩埋尸体的情况，发现有独木舟棺、人字顶木槨等特殊情形，存在“架棺”葬俗^[18]，并有学者推测岭南地区的一些狭长方形土坑墓使用船棺葬具^[19]。在此以棺槨保存较好或残迹比较清楚的广州汉墓、贵县罗泊湾汉墓及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20]等南越国墓葬为基础，对棺槨使用情况做简要讨论。

直接掩埋者都是些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葬，不使用木制葬具，而是将尸体及少量随葬品直接填埋。如广州汉墓 M1002，底部填土很干净，应该没有木棺；武鸣独山岩洞葬^[21]的尸体和随葬品放置在岩洞里端的长方形岩穴内，没有木棺痕迹。

有棺无槨者均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土坑墓，木棺填埋于土坑中，棺具多已腐朽，有些能够辨认出长方形木痕。如封开利羊墩 M19^[22]，墓底见有与填土颜色明显分界的黑

灰色方框，应为木棺朽痕，未见椁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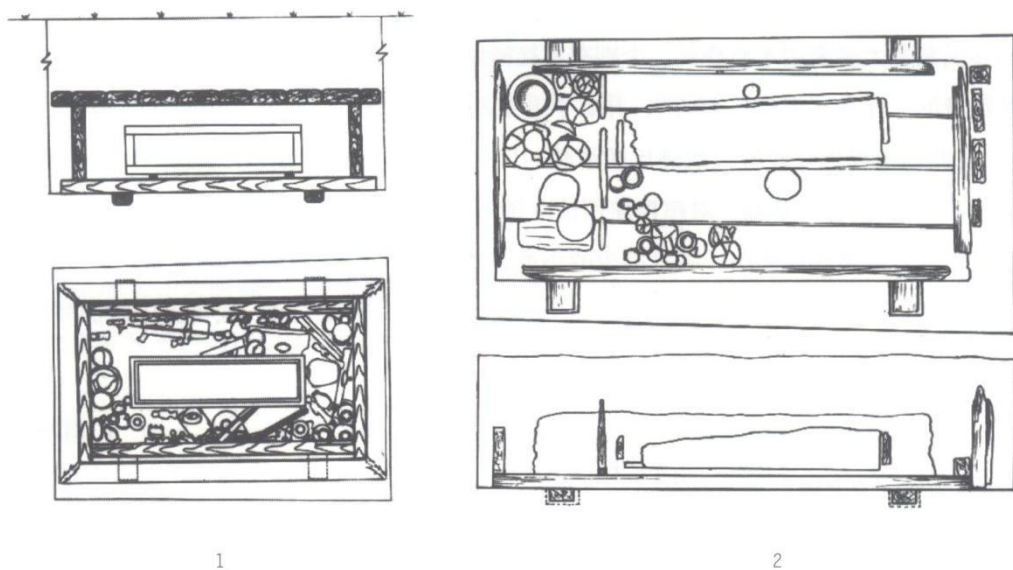
有棺有椁者根据木椁结构分为两类。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的木椁有“井椁式”和“封门式”两种形制。前者“由垫木、底板、壁板、盖板作两纵两横，间叠层累，组合成一个大木箱模样”；后者“椁室靠墓道一端做敞门式结构，门洞用若干根木柱直竖封堵，其余部分与上式同”。南越国墓葬的木椁结构也有这两种形制。

1. 井椁式

见于单室墓，木椁平面呈长方形，椁内不分箱。如广州瑶台柳园岗 M11，单椁单棺，木椁由底板、壁板和盖板组成，内部没有分箱结构，木棺置于椁内正中位置(图 2-4:1)。

2. 封门式

A 型：单椁室分箱。如广州瑶台柳园岗 M31，单室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以 5 根木柱封门，下有横木地袱，椁室内隔出头箱和棺箱(图 2-4:2)。又如广州汉墓 M1168，报告推测椁内两侧可能设有边箱。由于木椁多已朽毁，暂不能确定封门式木椁是否存在单椁室不分箱的墓例。



1.广州瑶台柳园岗M11 2.广州瑶台柳园岗M31

图 2-4 南越国墓葬井椁式和 A 型封门式木椁平面图

B 型：双椁室。见于单室墓和双室墓，包括不分箱、后椁室分箱、后椁室分层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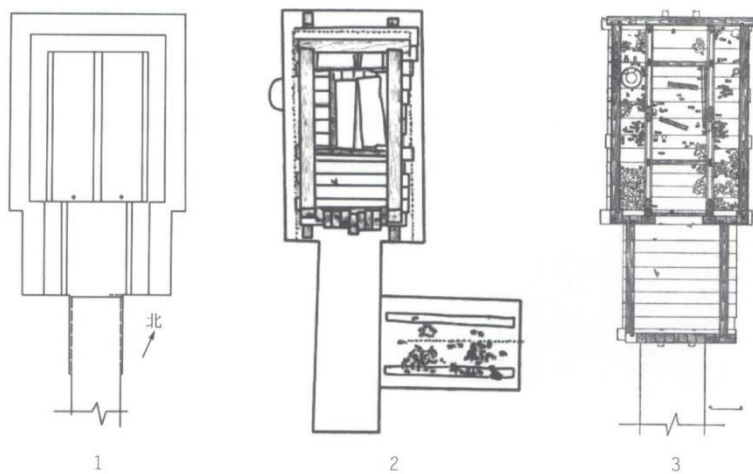
Ba 型：双椁室不分箱。如贺县金钟 M1，双室墓，平面呈“凸”字形，未见分箱迹象(图 2-5:1)。

Bb 型：双椁室且后椁室分箱。

I 式：单室墓，双椁室同宽，平面呈“日”字形^[23]。如贵县风流岭 M31(图 2-5:2)。

II 式：双室墓，平面呈“凸”字形。如广州汉墓 M1172，前椁室残朽较甚，后椁室

隔出边箱和棺箱：贵县罗泊湾 M2 椁室保存较好，前、后椁室之间为仿房屋板门结构，后椁室内部分隔成棺室、头箱、足箱和东、西边箱五部分（图 2-5:3），葬具为两重髹漆套棺^[24]。



1. 贺县金钟M1 2. 贵县风流岭M31 3. 贵县罗泊湾M2

图 2-5 南越国墓葬 Ba 型和 Bb 型木椁平面图

Bc 型：双椁室且后椁室分层，较罕见。此类墓葬大概只是后椁室分为上、下两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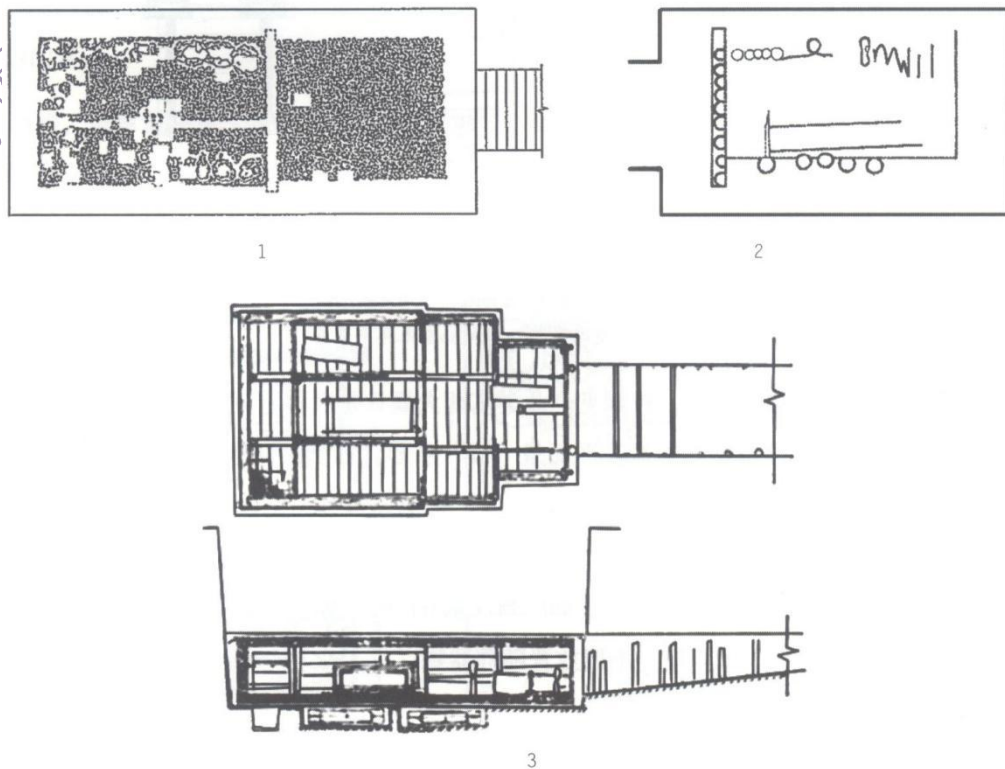
I 式：单室墓，双椁室基本同宽，平面呈“日”字形。如贺县河东高寨 M5（图 2-6:1），根据墓底鹅卵石中的“T”形沟槽和随葬器物位置，推测椁室分为上、下层，上层有棺箱和器物箱^[25]。

II 式：双室墓，平面呈“凸”字形。如广州汉墓 M1182，椁室朽毁严重，发掘报告推测椁室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放置双棺，下层放置随葬器物。

C 型：“人”字顶木椁。仅见于广州农林东路 2003GDMM68，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墓坑周壁支立粗大枋木，前、后（主）椁室分别由底板、边板、顶板和封门立柱构成，前椁室位于甬道处，为箱体结构；主椁室的顶板由两排斜向枋木相互支撑，为“人”字顶结构^[26]（图 2-2:6）。该墓是百越地区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墓之后发现的第 3 座“人”字顶木椁墓，属于南越国王室贵族等级。

3. 棺椁使用的一些特殊情形

贵县罗泊湾 M1 的椁室为“凸”字形连体结构，前、中、后三部分渐次加宽，前椁室、中椁室各隔出 3 个椁箱，后椁室被隔成 6 个椁箱，有些椁箱内有分层框架结构；主棺箱放置双层髹漆棺一具，其他两具漆方棺原来位置不明；椁室底板下设置 7 个殉葬坑和 2 个器物坑，殉葬坑内各放置一具木棺，其中 4 具为圆木棺^[27]（图 2-6:3）。罗泊湾 M1 受到楚墓椁箱形制的影响，殉葬坑、器物坑及墓道远端以外位置的车马坑相当于中原汉墓制度中的外藏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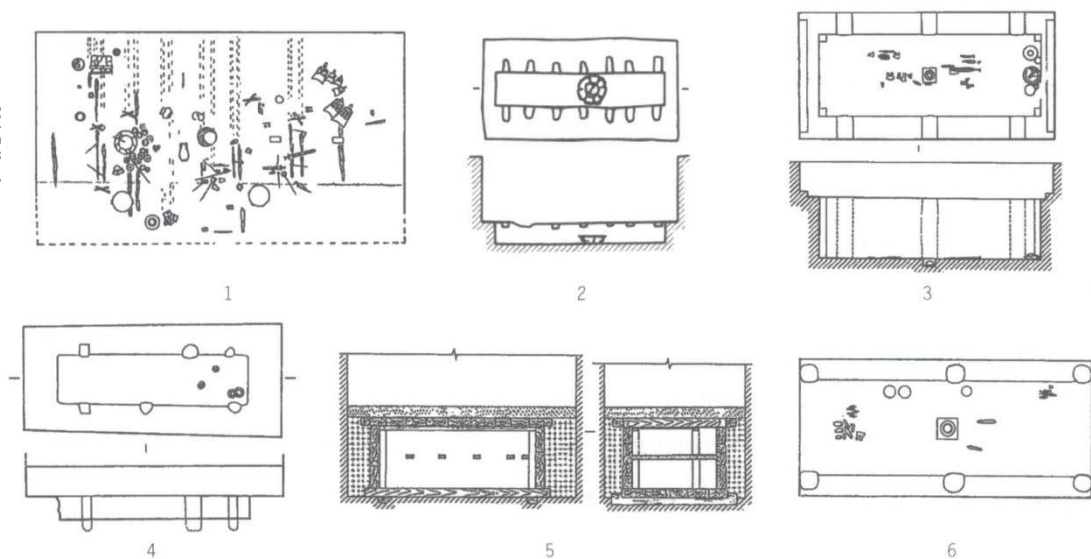


1.贺县河东高寨M5 2.广州汉墓M1153 3.贵县罗泊湾M1

图 2-6 南越国墓葬 Bc 型木槨和特殊形制木槨平面图

广州汉墓 M1153 根据柱印灰痕判断槨室为封门结构，从槨壁灰痕推测槨室“采用大木柱并列直竖组成”，柱壁内可能还贴有一层衬板，槨室内似有边箱，槨壁结构比较特殊(图 2-6:2)。广州汉墓 M1030 为长方形单室木槨墓，墓底铺小石，木棺用一段整木挖成，棺底齐平，棺口两端凿成弧形，形如独木舟，棺盖腐朽严重，以两条枋木承垫。此外，贵县罗泊湾 M1 和 M2、贺县金钟 M1 等在槨室外壁填塞膏泥，南越国墓葬还多见在槨底和槨盖上填铺木炭的习俗^[28]。

架棺是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特色葬俗，亦见于南越国墓葬。有学者推测岭南地区东周墓葬中的铜柱形器是棺架的柱头饰，棺架应当放置在木槨内^[29]，如肇庆北岭松山墓^[30](图 2-7:1)。平乐银山岭 M74、M114 等土坑墓的二层台长边两侧有对称柱洞^[31](图 2-7:3、6)，广州汉墓 M1060 生土二层台两侧各有 3 个柱洞(图 2-7:4)，可能与架棺的木槨结构有关；平乐银山岭 M55 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亦显示架棺迹象(图 2-1:6)。广州汉墓 M1048 为长方形单室木槨墓，井槨结构，槨室内偏上位置有承棺的木架结构(图 2-7:5)。徐闻五里镇 M1 为有棺无槨的小型土坑墓^[32]，可能是将木棺架放在二层台面上，并用悬空木枋承托(图 2-7:2)。



1.肇庆北岭松山墓（32、35、36：铜柱形器） 2.徐闻五里镇M1 3.平乐银山岭M74
4.广州汉墓M1060 5.广州汉墓M1048 6.平乐银山岭M114

图 2-7 南越国墓葬架棺结构示意图

四、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南越国遗存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的珠江三角洲、韩江流域、北江上游、西江中游、雷州半岛、贺江流域、桂江流域、右江流域以及越南北部地区。根据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方面的差异，酌情参考遗址材料，可以初步将南越国遗存划为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桂东北—粤西、桂东南—粤西南、桂西和越南北部等考古学文化区。受材料限制，越南北部地区暂不讨论。

（一）珠江三角洲区

西江干流在三水附近与北江汇合，始称珠江，与东江共同冲积出平坦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成为曾经著名的农耕区。以南越国首府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南越国遗存数量多、等级高，且考古学文化面貌共性较强。本区代表性遗存包括广州汉墓^[33]、广州象岗南越王墓^[34]、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35]、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36]等。珠江三角洲区土著越文化因素不及其他文化区突出，较少见土著越人比较流行的窄长方形土坑墓及二层台结构、墓底设腰坑、墓底铺小石等情况。除具有地方特点的双耳罐、三足罐、联罐、三足盒、三足小盒、提筒等陶器以外，约有 2/3 的墓葬随葬鼎、盒、壶、钫等汉式陶礼器组合。

珠江三角洲区墓葬形制多样，土坑墓、木椁墓和石室墓均有发现。土坑墓包括 A 型、Ba 型 I 式、Ba 型 II 式、Ca 型 I 式和 Ca 型 II 式等，木椁墓包括 Aa 型、Ab 型、Ba 型、Ca 型、Ch 型和 Cc 型等，D 型“人”字顶木椁墓和石室墓为南越国墓葬所仅见。不使用棺椁、有棺无椁和有棺有椁的墓葬均有发现，木椁有井椁式和封门式两种形制，

封门式木椁包括A型、Bb型Ⅱ式、Bc型Ⅱ式和C型“人”字顶等，见有使用棺架和独木棺的墓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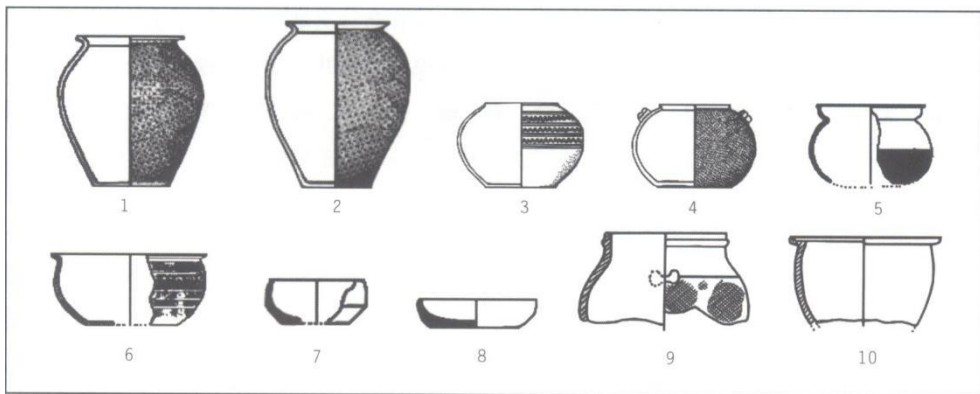
本区墓葬出土陶器丰富，种类包括瓮、四耳瓮、罐、双耳罐、四耳罐、四联罐、五联罐、甑、盒、小盒、三足盒、三足小盒、格盒、匏壶、温壶、提筒、鼎、壶、甗、豆、甑、釜、盆、孟、钵（碗）、杯、纺轮，及双联罐、三联罐、双耳盒、三足套盒、四联盒、八联盒、小甑、蒜口壶、温酒樽、卮、甗、熏炉、盘、盅、勺和模型明器井、灶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瓮、罐、三足罐、甑、盒、三足盒、鼎、壶、甑、釜、盆、碗（钵）等。珠江三角洲区遗存可以作为南越国陶器类型学研究和南越国遗存期段划分的基础材料，出土陶器的型式划分见表2-1至表2-12和附录《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二）粤东区

粤东区以韩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榕江、黄岗河等流域，北部和中部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南部为河口三角洲和沿海平原。本区南越国遗存发现较少，主要包括揭东面头岭墓地^[37]和五华狮雄山遗址^[38]，此外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39]、揭东先秦两汉遗址^[40]和揭西赤岭埔遗址^[41]均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

粤东区南越国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岭南大部分地区区别较大。本区未见设二层台的墓葬，也没有基底设置腰坑或铺小石的情况，陶甑形制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陶瓮形制也有差别。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出土的直口凸棱横耳罐、浅盘口深腹盆等陶器仅见于本区。

粤东区形制清楚的南越国墓葬仅见于Ba型Ⅰ式土坑墓，葬具无存。本区墓葬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瓮、甑、釜、盆、钵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瓮、罐、提筒、盒、豆、釜、盆、碗（钵）等（图2-8），出土陶器的型式划分见表2-1至表2-12和附录《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1.A型Ⅰ式瓮(F2:1) 2.B型Ⅰ式瓮(L1:10) 3.B型甑(L1:11) 4.B型甑(F3:64) 5.Bb型釜(M5:1) 6.Bc型Ⅱ式盆(M7:1)
7.AbⅡ钵(M15:8) 8.Aa型Ⅰ式钵(M26:1) 9.直口凸棱横耳罐(BT302④:129) 10.浅盘口深腹盆(BT101④:88)
(1~4.揭东面头岭墓地出土 5~8.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 9、10.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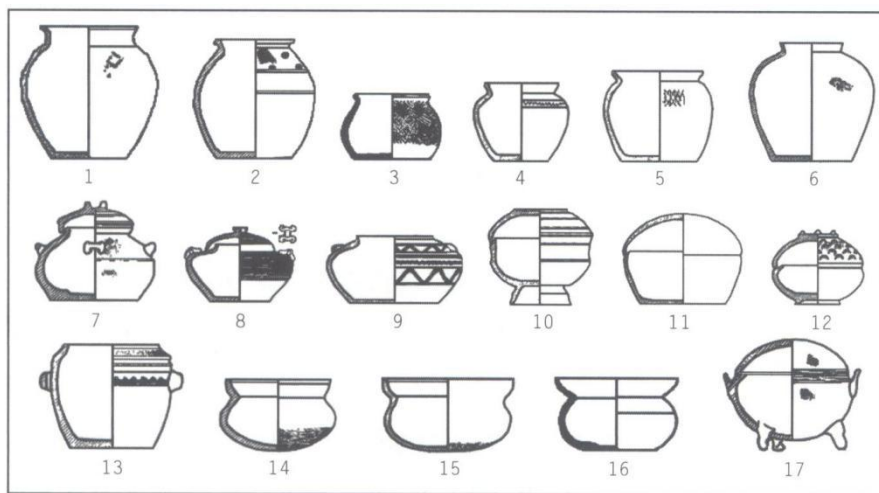
图2-8 粤东区陶器例举

(三) 粤北区

北江为珠江三大支流之一，在三水附近与西江汇合为珠江，流经韶关、清远等地区，主要支流有滙江、连江、绥江等，上游河谷较开阔，两岸多为丘陵山地，中下游河道较顺直，多峡谷。南越国遗存以乐昌对面山发掘清理的53座墓葬最为集中^[42]，其他有曲江马坝摇松岭M1^[43]和英德连江口遗址^[44]。英德连江口遗址可能为戍卫关城。

对面山墓地的墓葬有少量带二层台，个别墓底铺小石，墓底设腰坑的情况少见。Bb型罐、C型罐、A型提筒、Bb型盒等陶器较具地方特色，未见匏壶、三足盒、三足罐等南越式陶器，陶器种类明显少于珠江三角洲区，也不见珠江三角洲区较流行的绚纹。连江口遗址出土的素面板瓦亦有地域特色。有学者将北江上游地区的南越国墓葬列为考古学文化和族群分布的一个独立区块^[45]。

本区南越国墓葬多为土坑墓，见有Ba型Ⅰ式、Ba型Ⅱ式、Bb型的“凸”字形墓和刀把形墓以及Ca型Ⅰ式、Ca型Ⅱ式，木椁墓情况不明。棺椁使用有直接填埋、有棺无椁和有棺有椁等情况，具体情形不清楚。墓葬出土陶器比较丰富，包括瓮、罐、四耳罐、甑、盒、小盒、提筒、鼎、釜等（图2-9）。连江口遗址出土有瓮、罐类残陶片。粤北区出土陶器的型式划分见表2-1至表2-12和附录《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1.A型Ⅱ式瓮(M150:9) 2.D型Ⅱ式瓮(M75:1) 3.Ab型Ⅱ式罐(M1:3) 4.C型Ⅰ式罐(M106:14) 5.C型Ⅱ式罐(M105:4)
6.Bb型罐(M73:1) 7.B型四耳罐(M74:9) 8.Aa型Ⅰ式甑(M129:4) 9.Aa型Ⅱ式甑(M11:11) 10.A型Ⅲ式盒(M121:4)
11.Bb型盒(M106:16) 12.A型Ⅰ式小盒(M95:2) 13.A型提筒(M53:4) 14.Ba型Ⅰ式釜(M94:8) 15.Ba型Ⅱ式釜(M121:2)
16.C型釜(M1:5) 17.Ac型鼎(M106:3) (1、2、4~15、17.乐昌对面山墓地出土 3、16.曲江马坝摇松岭墓地出土)

图2-9 粤北区陶器例举

(四) 桂东北—粤西区

桂东北区北依南岭，南至浔江，基本属于漓江—桂江流域和贺江流域，大抵在梧州、封开一带与粤西区接境，域内多为石灰岩山地，多石林岩洞。西江为珠江干流，粤西河段江阔水深，在三水附近汇合北江入珠江三角洲。粤西区主要包括西江河段流

经的封开、德庆、肇庆等地。

桂东北区南越国遗存主要分布在平乐、贺县、灵川、兴安等地，包括平乐银山岭“战国墓”^[46]和西汉前期墓葬^[47]120余座，以及兴安石马坪墓地^[48]、贺县河东高寨墓地^[49]、贺县金钟M1^[50]和钟山铜盆12座^[51]，其中贺县金钟M1为王侯配偶级别墓葬。粤西区南越国遗存以封开利羊墩^[52]的10座西汉前期墓最集中，肇庆北岭松山墓^[53]应属于南越国越人王侯贵族。此外，桂东北区的贺州高寨城址、贺州长利村城址、兴安通济村城址可能建于南越国时期^[54]。

桂东北区南越国遗存的地方特征浓厚，与珠江三角洲区的文化面貌有一定差异。设二层台结构的墓葬比例较大，约占总数的1/5；墓底设置腰坑的情况极为普遍，初步统计有近百座；墓底铺小石者也有一定数量。随葬品组合一般为铜兵器（或陶纺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陶器多具地方特征。粤西区与桂东北区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相似。

学术界一般认为本区战国秦汉时期为西瓯聚居地^[55]，南越国时期见有土坑墓和木椁墓。土坑墓包括Ba型I式、Ba型II式、Bb型中的“凸”字形墓和墓道与墓室同宽的墓例，以及Ca型I式、Ca型II式和Cb型等；土坑竖穴木椁墓有Ab型、Ba型、Bb型、Cb型和Cd型等。多数葬具无存，棺椁使用有无棺无椁、有棺无椁和有棺有椁等情况，可判断形制者有封门结构的Ba型和Bc型I式木椁等。随葬陶器种类包括瓮、四耳瓮、罐、双耳罐、三足罐、四联罐、五联罐、甑、匏壶、盒、小盒、三足盒、三足小盒、鼎、壶、豆、簋尊、盆、甑、碗（钵）、杯、纺轮及三足釜耳罐、蒜头壶、扁壶、提筒、钵、灯等器物（图2-10），出土陶器型式划分见表2-1至表2-12和附录《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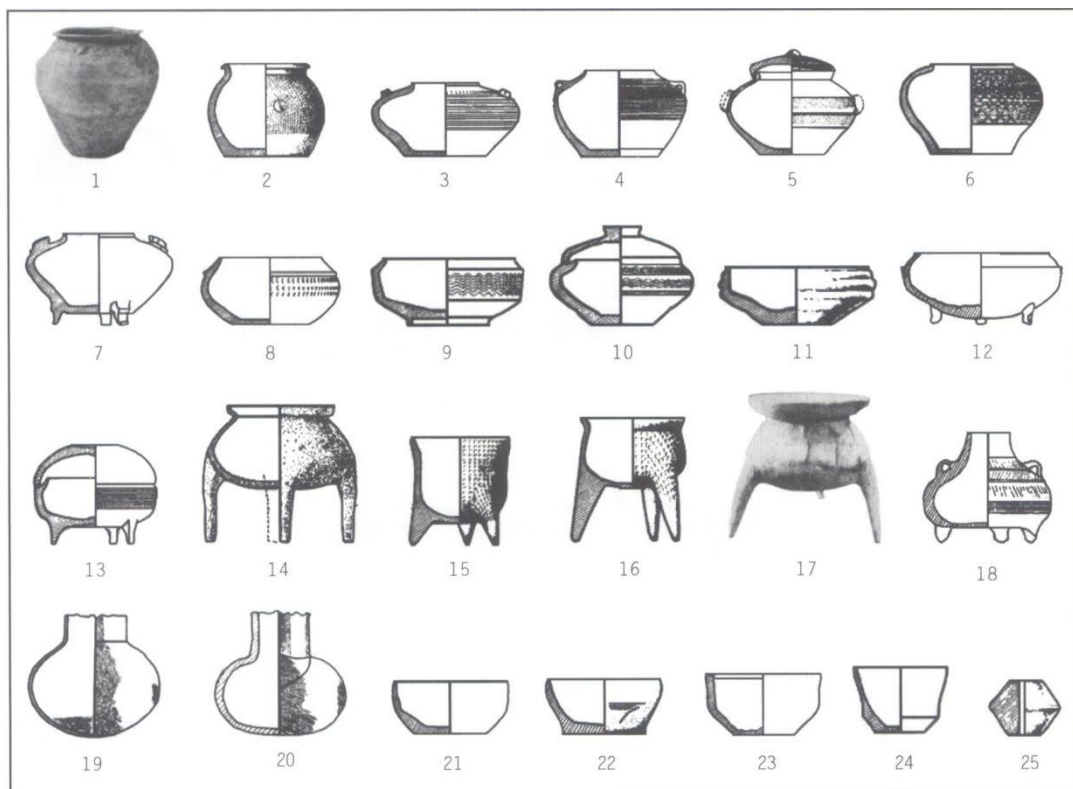
（五）桂东南—粤西南区

本区主要包括郁江冲积平原至雷州半岛及其东、西两翼地区。左江、右江在邕宁汇合后始称郁江，流经横县、贵港等地至桂平汇合黔江后称浔江，沿岸形成肥沃的郁江冲积平原。雷州半岛东、西两翼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分别包括广东茂名、阳江和广西玉林、钦州、北海等地区。桂东南区境内有北流江、南流江连通西江和北部湾。

桂东南区的南越国遗存主要有贵县罗泊湾M1、M2^[56]和贵县风流岭M31^[57]等王侯贵族墓葬，合浦近年来的南越国墓葬发现详见第三章；粤西南区的南越国遗存主要包括徐闻五里镇遗址及五里镇M1^[58]。

桂东南区南越国遗存以贵县罗泊湾等地的3座高等级墓葬为代表，墓葬形制具有地方特征，如罗泊湾M1墓坑上部在地表夯筑，坑壁经火烘烤；罗泊湾M2坑壁和墓口堆积烧结的青膏泥；风流岭M31木椁盖板和底板上、下铺木炭，二层台和木椁间以木

炭、黄土相间填实，坑壁上部经火烘烤等。这几座墓葬的出土陶器与珠江三角洲区相似，但是不出陶鼎，陶罐、E型陶甑、B型陶豆等也有地方特色，还出土有石寨山型铜鼓、羊角钮钟等具有滇文化特征的器物。粤西南区南越国遗存发现较少，徐闻五里镇遗址出土有绳纹筒瓦、板瓦和云树纹、“万岁”铭文瓦当，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多与珠江三角洲区近似。“今两广交界的贵县、茂名等县是古代西瓯、骆越的杂居地区”^[59]，考虑到以上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背景，以及西汉中期以后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共性，所以归并为桂东南—粤西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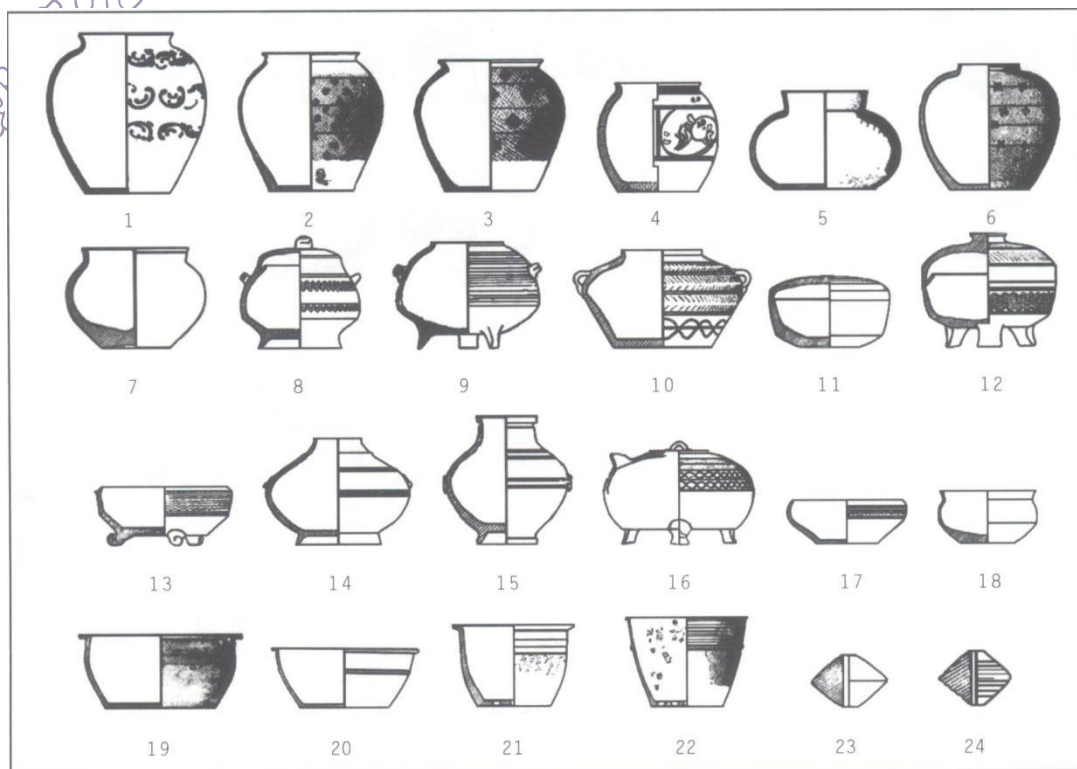


1.四耳瓮 (M26:2) 2.Ab型Ⅱ式罐 (M117:4) 3.Ab型Ⅰ式甑 (M115:8) 4.Ab型Ⅱ式甑 (M108:13) 5.Ac型Ⅰ式甑 (M22:14)
6.Ad型甑 (M74:1) 7.C型Ⅰ式甑 (M3:13) 8.Ba型盒 (M71:10) 9.A型小盒 (M73:5) 10.Ba型Ⅰ式小盒 (M93:4)
11.Bb型Ⅰ式小盒 (M153:15) 12.B型三足盒 (M92:8) 13.Ⅰ式三足小盒 (M108:4) 14.Bb型Ⅰ式鼎 (M15:4) 15.D型Ⅰ式鼎 (M129:3)
16.D型Ⅱ式鼎 (M115:6) 17.D型Ⅲ式鼎 (M33:2) 18.A型罐尊 (M119:12) 19.C型Ⅰ式壶 (M23:4) 20.C型Ⅱ式壶 (M118:5)
21.Ab型钵 (M22:4) 22.B型钵 (M153:16) 23.B型杯 (M129:1) 24.C型杯 (M65:4) 25.C型纺轮 (M104:1)
(1~4、6~18、21~25.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 5、19、20.兴安石马坪墓地出土)

图 2-10 桂东北—粤西区陶器例举

贵县罗泊湾 M1、M2 和风流岭 M31 等 3 座高等级大墓均为带墓道的木椁墓，其中罗泊湾 M1 置殉葬坑、器物坑和车马坑，风流岭 M31 置车马坑，均使用封门式木椁，风流岭 M31 属于 Bb 型 I 式，罗泊湾 M2 属于 B 型 II 式，罗泊湾 M1 椁室为“凸”字形连体结构，分成前、中、后三室。徐闻五里镇 M1 为 Ca 型 II 式小型土坑墓，有架棺迹象^[60]。随葬陶器种类包括瓮、罐、双耳罐、五联罐、三足罐、甑、小盒、三足盒、壶、豆、温壶、盆、孟、碗（钵）、釜、甑、纺轮等，遗址出土陶器种类包括瓮、罐、盆、（碗）钵、釜、纺轮和器盖、器座等（图 2-11），出土陶器型式划分见表 2-1 至表 2-12 和附

录《南越国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1.B型Ⅰ式瓮 (M2:96) 2.Aa型Ⅱ式罐 (M1:347) 3.Ba型Ⅱ式罐 (M1:345) 4.Aa型卷沿扁身罐 (M2:117)
 5.广口扁身罐 (M2:10) 6.小直口深腹罐 (M2:45) 7.直口鼓腹罐 (M2:62) 8.Ab型双耳罐 (M2:63)
 9.A型Ⅰ式三足罐 (M1:344) 10.Aa型Ⅰ式甗 (M2:13) 11.Bb型Ⅱ式小盒 (M1:248) 12.A型Ⅱ式三足盒 (M2:22)
 13.BⅡ型三足盒 (M1:350) 14.Aa型Ⅰ式壶 (M2:97) 15.Ab型壶 (M2:78) 16.B型温壶 (M2:52) 17.Ac型钵 (M2:46)
 18.B型Ⅰ式盂 (M2:84) 19.Ba型Ⅰ式盆 (M2:66) 20.Ba型Ⅱ式盆 (M2:71) 21.A型Ⅱ式甗 (M2:51) 22.C型甗 (M1:326)
 23.A型纺轮 (M1:265) 24.B型纺轮 (M1:258)

图 2-11 桂东南—粤西南区（贵县罗泊湾墓地）出土陶器例举

（六）桂西区

桂西区以右江流域为中心。右江为郁江正源，百色以上河段沿岸多高山峡谷，百色以下河段沿岸为丘陵地貌和右江盆地。根据对右江流域战国秦汉时期遗存的晚近认识^[61]，本区南越国遗存包括武鸣安等秧墓地^[62]和独山岩洞葬^[63]。

桂西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岭南其他地区的差别较大。武鸣安等秧墓地均为窄长方形土坑墓（Ba型Ⅰ式），布局整齐，未见墓底设腰坑或铺小石；独山岩洞葬的地方特色突出。本区南越国墓葬的随葬器物较少，以实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陶器多为灰色、灰褐色夹砂粗陶，以炊器为主，流行圜底器和平底器，少见圈足器，不见三足器，未见联罐、匏壶、三足盒、三足罐等典型南越式器物，尖圆底的D型陶釜颇具特色。

右江流域在战国秦汉时期为骆越聚居地^[64]，本区南越国墓葬包括土坑墓和岩洞葬两种形制，均未发现葬具，土坑墓属Ba型Ⅰ式。随葬陶器种类包括罐、双耳罐、杯、碗（钵）、釜和纺轮等（图2-12）。本区出土陶器的型式划分见表2-1至表2-12和附录

表 2-12 陶杯、陶觶尊、陶豆和陶纺轮型式统计表

文化区	陶器型式														
	杯				觶尊				豆		纺轮				
	A型	B型	C型	D型	A型	B型	C型		A型	B型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I	II							
粤东区															
粤北区															
珠江三角洲区		√				√	√	√	√		√	√			
桂东北—粤西区	√	√	√		√				√		√	√	√		
桂东南—粤西南区										√	√	√		√	
桂西区	√		√	√											√

(七) 小结

南越国建立在百越旧地，由于共同的战国越文化基础以及南越国域内文化交流发挥的作用，不同文化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粤北、桂东北—粤西、桂东南—粤西南等考古学文化区的遗存面貌表现出较多共性，如多见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及二层台结构和墓底设腰坑、铺小石等情况；陶器多为泥质硬陶，流行在方格底纹上戳印几何纹饰等。

南越国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的形成受到族群背景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珠江三角洲区分布有土著南越人群，桂东北—粤西区为西瓯活动区，桂东南—粤西南区为西瓯、骆越杂居之地，桂西区和越南北部区为骆越分布地，粤东区与闽越毗邻，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的遗存面貌也由此产生差异，如墓底设置腰坑的习俗在粤东区、桂东南—粤西南区、桂西区等地不流行。整体而言，粤东区、桂西区、越南北部区与岭南大部分地区比较疏远，考古遗存的个性特征较为突出。

南越国不同考古学文化区之间存在着交流互动，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区在其中占据着文化主导地位，在南越国后期对其他文化区的渗透尤其强烈，桂东南—粤西南区与桂东北—粤西区、桂西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南越国与周边地区包括海外的文化交流也很活跃，其中以中原文化的持续深入影响最具有历史意义。南越国诸考古学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及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互动，不但决定了岭南地区西汉前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格局（见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 [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5-48页。
- [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3页。
- [9] 发掘报告认为门道“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墓葬结构形式，位于墓道之后，墓室之前。门道设施有多种方式，门道大体由铺底板、阶梯、两侧的生土熟土台或直接的纵向木挡板、两侧的立柱等构成，且极有可能有木质覆顶。这种形制多见于广州地区南越国时期大中型墓葬和部分中小型墓葬，进入西汉中期逐步简化而消失，是极具南越国地域特点的一种墓葬结构形式”（见发掘报告注释8）。另参见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柱洞”》，《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5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 [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 [12]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邕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4] [越南]裴维英：《越南北部东山文化船棺葬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15] 郑君雷：《也说“瓯骆联盟”和“瓯骆国”》，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84-292页。
- [16] 韦伟燕：《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的研究为中心》，《学术探索》2015年第11期。
- [17] [越南]裴维英：《越南北部东山文化船棺葬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18]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19] 瓯燕：《论广东南越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载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中英文本），香港市政局，1993，第118-123页。对该文论及的广宁铜鼓岗、德庆落雁山、平乐银山岭等墓地，有些学者认为属于南越国时期。
- [20] 黄森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广州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第248-256页。
- [21]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22]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23] 《广州汉墓》划分的Ⅲ型墓为“有墓道竖穴分室木椁墓”，所谓“分室”指的是椁室分为双室，而墓室实际有双室和单室两种情况，如M1175墓室为单室，椁室则为双室。M1175这类前、后椁室等宽的单室墓平面呈“日”字形。另外，广州汉墓M1166属于Ⅱ型墓（竖穴木椁墓）5式（有墓道单室墓），发掘报告推测“室内原来可能分有前室与后室两部分”，亦属于此种情况。据此判断在南越国木椁墓中，存在一类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单室，木椁形制为前后等宽的“日”字形双室墓葬，包括广州汉墓M1166和M1175、贵县风流岭M31、贺县河东高寨M5等墓例。结合下葬方式，推测此类墓葬均属于设置墓道的封门结构木椁墓，研究

者先前似未加以充分注意此种情形。

-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98-101页。
- [25]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26]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5-48页。
-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5-19页。
- [2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5-48页。
- [29] 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7年第8期。
- [30] 广东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3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3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3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2008。
- [36]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李灶新:《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第三次发掘》,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广州出版社,2001。
- [37] 魏峻:《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51-102页。
- [38]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五华县博物馆:《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第11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
- [3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澄海市博物馆、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40] 魏峻:《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调查报告2003-2005年》,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129-180页。
- [41] 魏峻:《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190-200页。
- [4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4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考古》1964年第6期。
- [44] 梁明燊:《广东连江口发现汉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8期。
- [45] 郑君雷:《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 [4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4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4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石马坪汉墓》,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38-258页。
- [4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 [5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51]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钟山铜盆汉墓》，科学出版社，2018。
- [52]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53] 广东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54]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55]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 [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 [5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58]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59] 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42页。
- [60] 郑君雷：《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考古》2012年第3期。
- [61]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273页。
-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63] 武鸣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64]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